

先秦时期晋陕北部的戎狄与 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唐晓峰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长期生活着一些与华夏民族相异的人类群体, 一般称为戎狄, 他们与游牧的匈奴不同。戎狄的社会经济是农牧混合经济。在中国历史上, 戎狄对发展北方的畜牧业做出过贡献。汉族农业地带、戎狄混合经济地带、匈奴草原游牧经济地带形成古代中国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关键词: 戎狄; 匈奴; 游牧民族; 三元人文地理

中图分类号: K928.6; C952 **文章编号:** 1000-0585(2003)05-0618-07

1 引言: 戎狄—匈奴一体化的传统模式

先秦时期我国北方长期生活着一些在经济社会上与华夏民族相异的人类群体, 他们前后有过许多不同的名称。甲骨文中有鬼方、土方、工方等, 两周金文中有戎、玁狁、狄等。传世文献中对他们的称谓写法更是多样, 据冯家升统计达 32 种之多^[1]。

对于这些非华夏的族类, 历来有一种一体化的理解, 一脉相承的说法, 如《吕氏春秋·审为篇》:“狄人玁狁, 今之匈奴。”《晋书·匈奴列传》:“匈奴之类, 总谓之北狄……夏曰薰鬻, 殷曰鬼方, 周曰玁狁, 汉曰匈奴。”《史记》索隐:“鞞粥, 匈奴别名也。唐虞以上曰山戎, 亦曰薰粥, 夏曰淳维, 殷曰鬼方, 周曰玁狁, 汉曰匈奴”。

在这些文献中, 早期的戎狄与晚期的匈奴, 被看作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族群或民族, 匈奴是他们最后的总代表。司马迁正是带着这种观念来撰写《匈奴列传》的。《史记·匈奴列传》是最早系统记载古代北方民族人文特征的历史文献, 影响甚大。

《史记》等历史文献将早期戎狄与晚期匈奴一体化的处理办法, 给后世留下一个传统认识模式。直到近现代, 很多学者在涉及古代北方民族史的研究中, 仍沿袭戎狄—匈奴一体化的基本模式, 对许多有关历史问题都是在这个基本模式上作进一步阐发的。如在近代学术界影响极大的王国维, 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中就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 其族西自汧陇, 环中国而北, 东及太行常山中间, 中间或分或合, 时入侵暴中国, 其俗尚武力, 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见于商周间者曰鬼方, 曰昆夷, 曰薰鬻; 其在宗周之季, 则曰玁狁; 入春秋后, 则始谓之戎, 继号曰狄; 战国以降, 又称之为曰胡, 曰匈奴。”^[2]

正因为有戎狄—匈奴一体化的习惯性认识, 在现代撰写匈奴史的专门著作中, 往往把戎狄放在前面, 作为匈奴人的前身或匈奴史的序幕来处理, 从戎狄演进到匈奴, 似乎是顺

收稿日期: 2003-03-20; 修订日期: 2003-06-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40271031)

作者简介: 唐晓峰 (1948-), 男, 辽宁海城人,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文化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和教学。

理成章的。有关匈奴史的著作诸如林旅芝编《匈奴史》^[3]、刘学铤《匈奴史论》^[4]、林干《匈奴通史》等^[5]，都有这个特点。

把戎狄史研究附在匈奴史的研究之内，当然也有一些也许是站得住的理由。首先，早期的戎狄与后来的匈奴在活动的地理区域上十分相似（只能说是相似），都在华夏民族活动地域的北方。单纯从地理方位特征上说，他们都是“北方”民族。另外，从社会发展水平上看，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如汉族，从生活方式上看，他们又都缺乏“礼仪冠带”的传统。所以，他们又都属于“北方蛮族”。还有，在戎狄与匈奴的经济活动中，畜牧都占重要地位，这也很容易将他们归于同类。最后一个较具体的原因是，历史文献中有关戎狄的材料甚少，戎狄研究还不足以独立成卷，所以附在匈奴研究的范畴内。

将戎狄史放在匈奴史的范畴内，便很容易形成一种潜在的倾向，使人自然而然地以同一种框架来理解戎狄，以匈奴的社会特征、经济形态、文化特征、人种特征，来概括、代表、佐证戎狄的问题，好像匈奴的问题清楚了，戎狄的问题也就明白了。结果，因为匈奴是游牧民族，戎狄也就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一种游牧群体。在有关历史著作中，常可见到这样的笼统描述。例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就称“北狄不管哪一部分，都过着狩猎畜牧经济为主的游牧生活”^[6]。

将戎狄看作游牧民族，就产生了一个连带性的地理问题，即假如戎狄的确是游牧民族（或族群），那么在戎狄活动的主要地区——山西和陕西北部黄土高原的山地沟谷间（如果广泛来说，还有燕山山地、河西地带），古代就应当稳定、持久地存在过游牧形态的人文活动，这个地区的早期人文生态也要归于游牧的一类。这个地理问题在历史学家那里是没有什么人去深究，因为它似乎不属于史学的范畴。但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思考，这是一个事关中国北方早期人文地理分布大局、区域生态环境、人地系统机制的重大问题，应当给予认真的关注。难道，晋、陕北部黄土高原的山地沟谷环境，真能培育、维持一种“游牧”特征的人地系统机制吗？

2 对戎狄—匈奴一体化传统模式的否定

应该说，把戎狄与匈奴看成是一脉相承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观念是古人的误解。而现代学者由此而产生的推论，则更为不当。对于戎狄—匈奴一体化的传统模式，至少自 20 世纪 40 年代，便已经有学者认真地指出它的错误。这里可以例举徐仲舒、拉铁摩尔（赖德懋）、江上波夫。

徐仲舒在考察上古北狄的问题时也感到：“狄在殷周之世虽屡与中国相为婚姻，但其风俗习尚在经传中极少记载。即偶有记载，其词又甚简略，必须取后来史家记述边裔之土俗相与对照，庶得窥其全貌。”^[7]但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以匈奴为参照样板，而是取早期鲜卑、靺鞨等山林狩猎民族为范例，认为山林狩猎的特点“皆北狄之俗所宜有，而不必拘于《王制》所言之数事。且此诸俗皆与中国为近，而与匈奴之游牧文化相距较远也。”徐仲舒提到的《王制》是《礼记》中的一篇，这篇儒家经典是最早将北狄描绘成“有不粒食者”的文献之一，这实际上包含了戎狄与匈奴一体，为游牧群体的意思。徐仲舒不同意《王制》的说法，指出“狄”的习俗与中国近，而与匈奴远。这是相当敏锐的。

20 世纪早期，美国学者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中国生活、工作过很长时间，曾深入实地考察中国北方的“亚洲内陆边疆”地区，撰有《中国的边疆》一书。书中对中

国北方一些“非汉族”群体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这些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关于戎狄的问题，他根据一些文献记载的细节，并没有简单地将戎狄划在游牧的范畴，他认为：根据一些证据来看，戎狄所具有的只是一种混合经济。“周朝一位较早而比较可信的王（周穆王）征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如果它们是贡品，说明他们是狩猎而非游牧民族。如果是战利品，我们就更可以相信戎族的主要财富不是牲畜。而且，还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记载，说有一部分戎族被秦国逐出陕西之后，由山西的晋国给予荒地，他们开始从事耕殖，成为农夫。看来这个记载视戎族之属于汉族的国家是理所当然的事，除表述他们的组织不如汉族，或者其他的地位有所不及，并没有讲从游牧生活到农业生活的转变”^[8]。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也指出过戎狄部落与更北方的沙漠草原地带的族群的差异，他认为，“新石器时代蒙古高原的沙漠草原地区和长城地带的山岳盆地地区同时并存着两种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人民，前者是原始游牧人，和西方干燥地带的居民有亲缘关系，后者则以农业为主牧业为副，与南方湿润地带的人民联系比较紧密。进入青铜时代，长城地带的居民发生令人瞩目的变化，他们的产业不再是农主牧副，转而而为牧主农副，而且是从从事频繁战争的武士。”^[9]江上波夫这里所说的“后者”、“长城地带的居民”就是戎狄。对这些族群从“农业为主牧业为副”向“牧主农副”的转变，是江上波夫的更细致的观察，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注意。

20世纪后半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证据，以确凿有力的实物证据更进一步否定了戎狄—匈奴一体化的传统模式。根据这些材料所得出的结论，比拉铁摩尔、江上波夫那个时候所看到的東西，要更加准确一些。在中国考古学界，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地总结，并对“一体观”进行旗帜鲜明的批判的是林沄。他指出：“由于许多考古工作者艰苦而不懈的劳动，现在已经积累起一批先秦两汉时期北方民族的考古材料，揭示出文献所未载的具体文化面貌和体质类型特点。这样我们终于有了检验司马迁的观点是否正确的实际依据。对考古工作者来说，当然不应仍按司马迁的观点去看匈奴族源的问题，而应该首先注意汉代匈奴联盟所占据的广大地域中的前期遗存在文化上和人种上是否真有一致性，抑或可分出不同系统，在这样的基础上再重新考虑匈奴的族源问题。”^[10]

根据在古代戎狄分布地区所出土的同期考古材料，我们所能复原出来的是一种半农半牧的经济类型，而不是典型的“游牧”方式。畜骨、短刀、箭头是畜牧的特点，但石城遗址、房屋遗址、大型陶器、农业工具又反映了定居农业成分。在文化面貌上，有北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但也可看出中原文化的不少影响^[11,12]。对于这样一种社会生活形态，我们应当对之作独立考察，显然不能一笔将其划到骑马游牧、居无定所的匈奴的范畴了事。

根据考古材料，戎狄与后来的匈奴不仅社会类型不同，在族源上也不能简单地归为同类。从《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记载的一些匈奴词汇来看，其语言应属阿尔泰语系，与汉语根本不同，这反映了匈奴族属的北亚背景。在古代北方民族墓地材料中，可以看到有北亚人种与东亚人种的区别^[10]。参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诺音乌拉匈奴墓地的颅骨种族鉴定，大致可以肯定，早期匈奴本体应属北亚人种范畴。

北亚族群怎样在中国北方活动的问题可能是匈奴史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其对南部戎狄甚至汉族的同化改造，使其逐渐走向政治联盟，则是另一类问题。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

为匈奴曾对戎狄进行征服同化，就将戎狄等同于匈奴，^①就如同汉族对戎狄也进行同化，但不能将戎狄等同于汉族一样。

关于戎狄与匈奴的关系，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戎狄被匈奴征服同化，而加入匈奴的政治同盟，并普遍冠以匈奴的总称。但这段历史并不能代替戎狄在被匈奴征服同化之前的一段很长时期的独立发展的历史。何况，在这段独立的历史中，戎狄的经济类型、社会文化特征与后来的匈奴有本质的区别。我们不同意戎狄—匈奴一体化的模式，实际上就是不同意抹杀这种区别，因为只有充分认识这种区别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解释北方历史地理的一些重大问题。

从晚期的历史结果来看，戎狄群体（特别是北方的戎狄）几乎全部在历史中消失，被分别融合到汉族或匈奴之中。这种结果给后世的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戎狄从来就没有什么独立的历史地位，它们只是在历史的两元对峙，即华夏帝国与草原帝国的对峙的基本框架中的不确定的、过渡性的、非典型的、边缘性的人文现象，所以没有太高的历史价值。我们说，这样的看法抹杀了中国北方早期历史的一个本质性内容。戎狄在早期历史中的贡献，特别是在发展壮大畜牧业的贡献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我们应当还其独立的历史地位。

3 中国古代北方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否定戎狄—匈奴一体化的观念，不但还了鬼方、獫狁、戎、狄等以独立的民族地位，在历史地理意义上，也还了晋陕北部等戎狄分布地区独立的人文地理地位。如果独立地看待戎狄地区的人文地理特性，则中国古代北方呈三元人文地理结构。

长期以来，由于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的长期对峙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再加上北方长城的修筑，使人很容易将北方只看作两元的结构。实际上，这种两元结构只是在南北两大帝国形成以后，尤其是戎狄消亡之后才出现的，而在戎狄活跃的时代，即商周时代的大约 1 千来年里，中国北方可以依照人文特征，大体划分为三个大的人文地理地带，即中原的发达农业区、晋陕北部等地的戎狄活跃区、以及北方草原地带^②。

我们这里所说的三元人文地理结构，实际上是要强调戎狄地带的独立特点和历史地位。对于戎狄地带的重视，是受两类学术研究的推动。一方面是考古工作的成果累积，如上所说，在戎狄分布地区的考古发现，需要人们对其族属和文化特点、社会性质做出研究、认识。另一方面是历史上生态环境演变问题的提出，推动了对“过渡地带”的重视。如学者们所指出的：“每当全球或地区出现环境波动时，气温、降水等要素的改变首先发生在自然带的边缘，这些要素又会引起植被、土壤等作相应变化，进而推动整个地区从一种自然带属性向另一种自然带属性转变。”而环境波动对于边缘过渡地带，“不但导致自身自然属性的更替，而且也会影响人类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在人类历史的早期，这样的影响几乎对人类经济生活方式起决定性的控制作用，促使人们从一种生产类型转向另一种生产类型。”由于农、牧业生产依托的环境不同，因此随着自然属性的变化，人类在这里

^① 匈奴联盟兼并了许多本来各自分立的族团。例如，楼烦白羊河南王在被匈奴兼并后便被称为“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从汉人看来，既然楼烦此时已是匈奴的一部分，则战国时代的楼烦自然可以看作汉代匈奴的前身。

^② 关于草原地带及其以北，当时还没有与中原的人们发生太多的直接关系，但沿着“草原之路”与西方的交流应当已经开始了。这可以从所谓斯基泰文化和卡拉索克文化中看到。

“首先打破原始农业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原始农业基础上萌生了畜牧业，然后渐次形成独立于农耕业的畜牧业空间区域。”^[13]

戎狄正是古代处于中国北方的过渡地带、或曰边缘地带、或曰生态敏感地带的一个主角，而戎狄的起源与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整个生态变化有关，戎狄起源的过程就是中国古代北方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生活方式产生的过程，我们关于戎狄的概念离不开畜牧业。戎狄的兴起反映了人类对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方式，在“适应”中也伴随着创造，畜牧业就是一个创造性的成果。

距今约5千年前出现气候由湿热转向干冷的波动，在这个地区产生的人文影响是一场实质性的变化，根据考古材料，原本占统治地位的原始农业渐渐退化，为适应新的环境条件，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出现变化，有学者设想，“杂食的猪会与人争夺野生粮食资源，草食的羊则可提供人类另一种粮食原料，人们自然养羊而舍猪。”^[14]在食物以外的生活资源上，畜产品也会逐渐增多。在更多地依赖牲畜的情况下，畜牧技术自然会逐步改进，所以当时的变化是退化的农业与进化的畜牧业同步发展。这样的社会与气候变化不足以造成如此影响的中原农业社会当然不同，两边社会的差距于是越来越大。

在农业退化而畜牧业进化的区域中艰苦生活，并与中原地区差异渐大的人群，应该就是中原人所谓的“戎狄”。戎狄的生活中保留了一些农业的成分，又逐渐增加着畜牧业的比重。最终形成半农半畜的混合经济。戎狄的半农半畜状态，稳定存在了百千年。在人文地理面貌上，戎狄地区逐渐形成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独立地带。《小孟鼎》记西周早期与北方戎狄（鬼方）战争，俘人13081^[15]，这又反映了戎狄社会的不可忽视的组织规模。

在中国历史上，戎狄社会的贡献不仅是发展了畜牧业的规模、技术，将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础的地位，并且为后来草原大规模游牧经济的产生建立了必要的基础，做好了历史准备。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农畜混合经济是环境变化所推动，则草原游牧经济的出现，主要是人类畜牧技术发展所推动。在对牲畜的控制能力增强、乘马的使用出现之后，人们就有条件彻底抛开农业，到新的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大规模开展畜牧活动，并建立一种新式的依托大规模游牧经济的社会。

游牧经济是畜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学者们已经指出的事情。如杜正胜说：“中国的考古资料与文献都显示当北方逐渐干旱时，这里出现了与南方农业城邦对峙的社群和文化。不过从殷商到西周，他们的家畜畜养业即使日占重要，基本的生产仍以锄耕农业为主，大概自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以后，中国北方民族的社会与经济才发生极大的转变，从农牧混合经济转为专化游牧经济，也就是从‘畜牧’转为‘游牧’。伴随而来的是形成与南方农业国家有别的游牧文化。游牧和畜牧虽然同样饲养牲口，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则截然不同，具有本质性的差异。”^①

不过，在这段话中，杜正胜忽略了从“畜牧”转为“游牧”的地域条件问题。显然，并不是每一处混合经济都可以转为专化的游牧经济，或者说并不是混合经济普遍地转变为专化游牧经济。一般畜牧经济转变为游牧经济，不会是就地完成的，而有一个地理环境重新选择的问题，或者说，只是在特定的地区，“畜牧”才转变为“游牧”。这个问题，是我

① 已经有学者就鄂尔多斯专化畜牧业起源的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如王明珂：《鄂尔多斯及其邻近地区专化畜牧业的起源》（未刊稿），本文在杜正胜前引文中被引用，不知后来是否正式刊出。

们强调北方三元人文地理结构的又一层意义：即从畜牧混合经济到大规模专化游牧经济的发展，是人类畜牧活动向新的地理环境的跃进。这一转变，导致了一个新的具有突出特征的人文地理地带的形成，即游牧地带。而原有的畜牧混合经济，在原有的地理地带的许多部位，仍然保留着，这就出现了混合经济地带与游牧经济地带的对峙。

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畜牧经济转变为游牧经济，实际上就是山谷畜牧经济转变为草原游牧经济。在中国北方自然地带交错地区的畜牧经济，主要是以戎狄分布地区为代表，而这类地区，大多为山谷林地。在这类地区与草原地区的交接处，应该是游牧形态的“生长点”。这类生长点在草原的周围多有分布，其中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处在戎狄环绕之中，同时，鄂尔多斯又具备草原广野的地理特征，适宜专化游牧业的最先发展。历史上匈奴人反复占领鄂尔多斯地区，就是这种特征的反映。

4 结语

总之，在中国北方，当草原游牧经济成熟发展，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特殊的草原社会之后，一个三元的人文地理结构便清楚地显现出来。这个三元结构，是自然环境与人类历史发展相互作用的综合产物。

在中国北方原来的戎狄之中，有一部分转化为游牧人，但后来被可能是在更远的北方发展壮大起来的匈奴游牧族群所吞并，成为匈奴帝国的部属（比如林胡和楼烦）。在草原游牧世界，呈现出与戎狄半农半畜地带、中原农业地带均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形态。匈奴帝国是草原游牧社会的政治形态的最早代表，其对整个亚洲北部的影响，对华夏农业帝国的影响，都是深远的。戎狄地带，在北方草原帝国与南方华夏帝国的夹峙之下，基本没有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在这个背景下，原先十分明显的戎狄半农半畜地带，渐渐变为中国北方的政治过渡区，其经济社会随政治的动荡而变化，它的独立地位才越来越模糊了。

参考文献：

- [1] 冯家升. 匈奴民族及其文化. 见：禹贡半月刊，1937，7(5)：21～34. 文中以为这三十多种称呼都是匈奴的别名.
- [2] 王国维. 鬼方昆夷獯鬻考. 见：观堂集林. 卷十三. 北京：中华书局，1959. 583～605.
- [3] 林旅芝. 编. 匈奴史. 香港：香港中华文化事业公司，1963. 26. 此书引王国维《鬼方昆夷獯鬻考》，并引梁启超《国史研究》六篇中的列表，将古代各类戎狄都归为匈奴.
- [4] 刘学铤. 匈奴史论. 台北：南天书局，1987.
- [5] 林干. 匈奴通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书中注意到戎狄与匈奴的区别，但忽略了其间的社会形态差异和地理区域变化.
- [6] 翁独健. 主编.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6.
- [7] 徐仲舒.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 见：古今论衡，1999，(3)：171～200. 本文为徐仲舒先生遗稿，写作年代是1948年，引文见175，177.
- [8] 拉铁摩尔. 中国的边疆. 赵敏求译. 正中书局，1941. 第11章. 翻译词句有改动.
- [9] 江上波夫. エウラシア古代北方文化. 东京：山川出版社，1948. 转引自杜正胜(见[14])，294～295.
- [10] 林. 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研究. 见：林. 学术文集.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365～386. 引文见369.
- [11] 田广金. 朱开沟.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 [12] 张映文，吕智荣. 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8，(1)：47～56.
- [13] 韩茂莉. 农牧交错带的形成与气候变迁.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 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151～166. 引文见151.

- [14] 杜正胜. 欧亚草原动物纹饰与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 台北: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93, 第 64 本, 第 2 分, 231~408. 引文见 303.
- [15] 郭沫若, 小孟鼎. 见: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上海: 上海书店, 1999.

The herding husbandry peoples in the norther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and the macro human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f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Pre-Qin times

TANG Xiao-feng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pre-Qin dynasty, there were groups of people, called Rong (戎) and Di (狄), in the northern Shanxi and Shaanxi provinces, who were not the same kind of nomadic people as Xiongnu (Hun) since they lived in a mixed style of economic situation, half herding and half agricultural. But, in the traditional documents of the dynastic times, these groups of people have been described as the same kind of nomadic people like Xiongnu, some were even identified as the ancestors of Xiongnu.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identity of Rong and Di cause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region where the Rong and Di lived.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idea,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gion of the northern Shanxi and Shaanxi had, as well as the steppe, supported nomadic life. The essential different ecological functions in early civilization crea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northern Shanxi/Shaanxi and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teppe, therefore, were neglected.

The recent archaeologist discoveries show that the life indicated by the settlement ruins, tombs, and life remains of Rong and Di people has been more a sedentary style, which had been combined with partly agricultural and partly herding activities. The archaeologist discoveries also show that before the Rong and Di times, the region of the northern Shanxi/Shaanxi had been occupied by a well developed prim-agricultural economy. Since the climate changed colder about 5000 years ago, the herding activity develop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pure prim-agricultural economy was replaced by half agricultural and half herding.

The Rong and Di, therefore, was not the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nomadic in northern ancient China. The true nomadic people,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Xiongnu, appeared later than Rong and Di in China. 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 of nomadic economy in China should be considered more with the Xiongnu instead of the Rong and Di.

Since the recognition of the independent identity of the Rong and Di, the macro human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 China then should consist of three great regions: the region of the Rong and Di, the standard agricultural region in the south where the Han people were living, and the typical steppe nomadic region in the north where the Xiongnu became occupiers.

Key words: nomadism; Hun (Xiongnu); northern China